
上海经济稳增长的动力机制和举措建议¹

吴璟桉¹ 吴永康²

(1.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0020 ; 2. 上海大学 200444)

【摘要】: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上海应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在“城市新投资、社会新消费”上实现增长,激发城市新需求;在“经济新开放、区域新协同”上实现突破,形成城市新势能;在“产业新赛道、企业新生态”上实现培育,引爆产业新热点;在“要素新配置、功能新辐射”上实现创新,发挥市场新效应,促进上海成为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交汇地。

【关键词】:上海经济 稳增长 动力机制

【中图分类号】:F127.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309(2023)03-0014-010

一、上海经济稳增长的内外环境分析

当前,上海经济发展外部环境愈加严峻复杂,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实现经济稳增长的难度明显增强。

(一)世界经济危机根源仍未消除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国普遍采取货币扩张、量化宽松等手段进行“逆周期”调控,这掩盖甚至激化了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结构矛盾和危机隐患。当前,这些深层次矛盾愈发凸显,给经济发展带来不确定性风险。

一是生产过剩:产能扩增与需求萎缩的矛盾。世界各国政府普遍采取货币扩张、量化宽松等手段大力推动社会投资,导致许多行业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国际铜研究组织(ICSG)表示,2022年全球铜供应过剩14.2万吨;世界金属统计局(WBMS)数据显示,2022年上半年全球锌市供应过剩16.8万吨;半导体行业预计,2023年芯片产业将面临产能过剩问题。

二是债务过剩:债务激增与经济低速增长的矛盾。近年来,世界各国尤其是欧美国家大幅扩张债务,促进社会消费和投资。国际金融协会(IIF)数据显示,2021年全球债务规模升至303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记录,全球央行债务占全球GDP比重从2020年的90%升至2021年的105%。世界经济发展增速放缓甚至衰退,债务扩张的做法不可持续,庞大债务对世界经济持续发展带来巨大风险。

三是货币过剩:货币扩张与预期消极的矛盾。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全球基础货币量呈现加速增加趋势。2008年全球基础货币总量为4万亿美元,2021年全球基础货币总量超过36万亿美元,增长9倍;但同时期,实体经济投资和消费放缓,货币大量涌入股票、债券、房产、大宗商品等领域,扰动生产生活物资价格,给经济带来巨大波动风险。

(二)全球新产业革命方兴未艾

¹ 作者简介:吴璟桉,经济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吴永康,上海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先进技术能使企业创造超额利润。按照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创新会产生新产品、新服务，率先入场的企业可获得超额利润，从而引发新一轮投资、消费、就业浪潮。

一是战略层面：各国加快抢占新产业新赛道。伴随经济复苏面临的严峻挑战以及科技创新带来的发展动能，世界各国加快科技布局。例如，2021年，美国发布的《量子网络研究协同路径》要求推动量子计算机等关键瓶颈技术研发，欧委会发布的《2030数字指南针：欧洲数字十年之路》将量子通信纳入战略规划，日本“第六期科学技术与创新基本计划”将人工智能列为重点研发技术。

二是产业层面：数字革命成为新一轮技术革命核心。从蒸汽革命、电气革命、信息革命，再到数字革命，每一次技术进步都产生巨大的经济能量。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6.8万亿美元，占GDP比重为39.8%，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撑作用更加明显。未来，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等核心产业均有万亿元赛道，将成为产业发展新引擎。

(三) 国际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大

2022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分析外部环境时，强调“外部环境动荡不安，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影响加深”。

一是技术封锁：美国从多维度遏制我国科技和产业发展。美国将光刻机、航空发动机等关键技术和设备列入出口管控清单，限制对我国出口这些技术；截至2022年6月，将446家中国企业或机构列入制裁清单，进行技术打压和封锁，并持续收紧赴美中国留学生在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战略领域的留学签证。

二是地缘冲突：俄乌冲突严重冲击全球经济秩序。受俄乌冲突影响，2022年6月全球食品价格同比增长23.1%，全球食品价格处于高位。因欧美对俄制裁，欧洲天然气价格持续上升，大量企业减产停工，严重影响以天然气为原料的塑料、化肥、材料等行业。

三是加息扰动：新一轮加息周期引发多重风险。(1)货币贬值风险。2015—2018年美国开启加息周期，诱发阿根廷货币比索贬值超过30%。(2)资产收缩风险。2000年美联储快速加息，导致市场流动性大幅收缩，刺破海外股市和互联网泡沫，大量财富消失。(3)经济衰退风险。2003年美国大幅加息引发高负债的拉美国家主权债务违约，“股债汇”大崩盘，形成“拉美金融海啸”，引发经济衰退。

(四) 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出现减弱苗头

自2012年始，我国经济从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5%~6%的中高速增长，受新冠肺炎疫情、人口红利下降等因素影响，近两年经济增速进一步降低。2022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深刻地剖析了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困境。

一是需求收缩：投资和消费下降导致发展需求不足。首先，投资势头不容乐观。2022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57.9万亿元，增长4.9%，低于2019年的5.4%(图1)。其次，消费存在萎缩风险。2022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3.9万亿元，比上年下降0.2%，2020—2022年平均增速只有2.5%。

二是供给冲击：地缘冲突和疫情反复冲击生产秩序。受俄乌冲突等因素影响，国际原材料和能源价格大幅上涨，输入性通胀压力增加，导致我国企业生产成本快速上升，国内汽、柴油每吨价格快速上涨。受疫情反复影响，我国及全球供应链关键环节面临中断风险。

三是预期转弱：需求侧和供给侧双重冲击导致预期转弱。民众对经济持续增长预期下降，稳增长压力凸显。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自 2021 年一季度以来企业家景气指数一直呈下降趋势，从 125.2 降到 117.2(200 为满分，100 为及格线)；同时，居民消费信心不足，自 2022 年 1 月以来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下滑，从最高的 121.5 降到 12 月的 88.3。

(五) 上海发展前有标兵后有追兵

上海在发展和定位上一直对标纽约、东京等全球顶尖城市，但当前上海经济发展距离纽约、东京还有很大距离，且面临北京、深圳等国内一线城市的快速追赶，上海作为我国经济第一城面临严峻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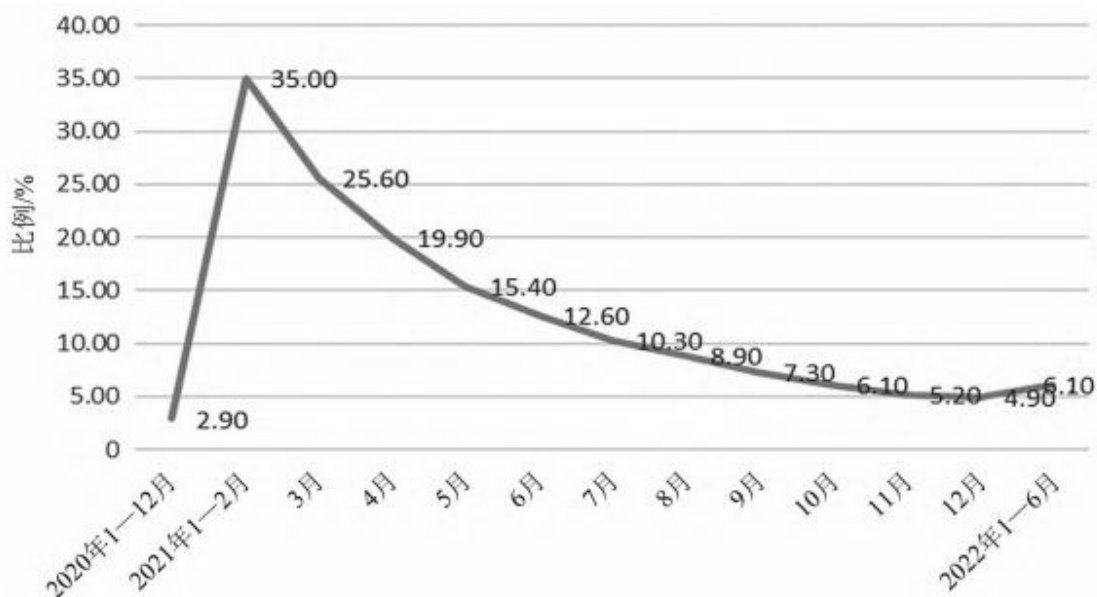


图 1 2020—2022 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变化趋势

一是经济总量：面临北京的“快速逼近”。与北京相比，上海的经济规模优势越来越小。2011 年北京 GDP 为 16000 亿元，经济总量约为上海的 83%，但 2022 年北京 GDP 为 41610 亿元，经济总量约为上海的 93.1%，两者差距大幅缩小。

二是经济密度：远未达到全球顶尖城市能级水平。2021 年上海每平方公里 GDP 是 6.8 亿元，深圳是 15.35 亿元，东京是 30.8 亿元，纽约更是达到 90.2 亿元，上海经济密度远低于这些全球顶尖城市。在建设用地上存在硬约束的情况下，上海经济发展空间和增幅存在较大限制，经济高质量发展任务十分紧迫。

三是人均 GDP：人均 GDP 大幅落后于全球顶尖城市。2021 年上海人均 GDP 是 18.70 万元，深圳是 22.82 万元，东京和纽约分别是 48.84 万元和 83.35 万元，上海处于落后位置。上海人均 GDP 与建设国际经济中心、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城市的地位不相匹配。上海应在人均 GDP 上下功夫，加快引进各层次优秀人才，进一步激发人才活力。

二、上海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上海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态势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但在经济保持增长的同时，各种结构性和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进一步凸显，经济发展的传统动力和增长方式面临严峻挑战。

(一) 产业动力发展培育不足

一是从传统制造业看，重点工业增长进入“波动期”。电子设备、医药、通用设备等重点工业发展增速起伏较大，发展放缓，已难以支撑上海制造业持续稳定发展。2017 年上海汽车制造业增速为 19.1%，2019 年增速降为-4.4%，起伏巨大；2017 年以来，通用设备制造业延续中低速增长态势，2019—2020 年连续两年增速为负值；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近 5 年平均增速不到 3%，2021 年增速只有 1.4%。

二是从现代服务业看，辐射能力与全球顶尖城市有较大差距。上海服务业仍以金融、房地产、商贸为主，相较纽约、东京等城市，专业性强、辐射范围广的商务、航运、专业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足。2021 年，上海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超 63%，而纽约、东京比重超过 70%。

三是从战略性新兴产业看，新兴产业不具有发展优势。2019—2021 年，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速比北京高，但增加值总量及占 GDP 比重都低于北京。同时，上海三大先导产业发展面临激烈竞争。以集成电路产业为例，江苏在芯片制造和封测的产业规模都列全国第 1 位；在人工智能领域，2021 年上海产业规模为 2800 亿元，面临北京的快速追赶（产业规模超 2000 亿元）。

（二）投资动力缺少后继需求

一是从产业投资看，传统投资增速相对落后，增长动力不足。在工业投资方面，2019—2021 年上海平均增速为 12.1%，低于深圳的 13.57%，远低于北京的 19.07%。在服务业投资方面，2019—2021 年北京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平均增速为 35%，远超上海同期水平（14.6%）。

二是从基础设施投资看，传统投资增速下降，发展形势严峻。自 2018 年开始，上海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开始下降，从 2018 年的 9.3% 降到 2020 年的-3.6%，2021 年投资增速开始反弹，但仍未超过 GDP 增速，这在一定程度上拖累了上海经济增长步伐。

三是从房地产投资看，传统投资延续中低速增长，对经济增长贡献有限。在房住不炒等国家政策背景下，上海房地产投资增速不会有大幅提升，将延续自 2017 年以来 5% 左右的中低速增长态势，不能对经济产生较强的拉动作用。

（三）消费动力呈下行态势

一是从消费规模看，受疫情影响明显，增速逐渐降低。2020 年上海商品销售总额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为 13.98 万亿元和 1.59 万亿元，分别下降 2.6% 和增长 0.5%。2017—2022 年 6 月，上海商品销售总额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也呈下行态势（图 2），后者增速从 8.10% 降到-16.10%。

二是从消费领域看，各种类型消费萎缩，消费形势恶化。2017—2021 年，上海批发和零售额增速呈平缓下降态势，增速从 8.2% 降到 2.6%，只有 2021 年因 2020 年基数较低实现反弹。住宿和餐饮零售额增速也呈下降态势，只有在 2021 年实现反弹，2020 年更是大幅下降 19.6%。

三是从消费方式看，新型消费培育不足，潜力挖掘不够。截至 2021 年底，上海离境退税商店不足 550 家，远少于新加坡的 4000~5000 家。此外，2021 年上海网络零售额为 3365.78 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18.6%，而同期北京网络零售额为 5392.74 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36.3%，是上海的 2 倍。

（四）贸易动力面临需求萎缩

一是从贸易规模看，进出口总额增速放缓。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放开，各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恢复正常，订单正快速回流到这些国家。2022 年 1—6 月，印尼出口额同比增长 37.1%、越南增长 17.3%，我国出口额大幅增长的“国际产能替代效

应”将难以持续。

二是从贸易方式看，外贸增长新动力培育不足。2021 年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额达 1.92 万亿元，自 2017 年以来增长 10 倍，未来跨境电商有望成为外贸增长的主导力量。然而，上海跨境电商发展相对滞后，2021 年上海跨境电商进出口额不足 300 亿元，不及郑州(1092.47 亿元)、宁波(1232 亿元)、广东(3310 亿元)。上海跨境电商若不能实现跨越式发展，上海口岸贸易功能存在下降风险。



图 2 2017—2021 年上海商品销售总额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

三是从贸易空间看，供应链重塑降低外贸发展前景。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脆弱性，世界各国正加速推动产业链区域化、本地化。例如，新版《美墨加协定》规定，北美地区所产汽车 75%及以上的组成部件产自本地区方可享受零关税优惠，以此提高产品零部件在北美生产的比例；日本推出“供应链改革”项目，计划投资 20 亿美元，帮助本国企业将零部件生产线特别是高附加值产品的制造转回本土或转移至亚洲、非洲等多个地区，以实现供应链多元化；汽车芯片龙头企业安森美将上海全球配送中心迁往新加坡，以防止供应链过度集中在中国。这些重构供应链的举措将进一步削弱上海外贸发展前景。

(五)要素动力存在明显瓶颈

一是从土地要素看，土地利用约束大、成本高。《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 年)》提出，2035 年上海建设用地规模不超过 3200 平方公里。《上海市自然资源利用和保护“十四五”规划》要求，至“十四五”末上海建设用地总规模不突破 3185 平方公里，这意味着 2025—2035 年上海建设用地增量仅为 15 平方公里。建设用地的规模天花板对上海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约束。

二是从人才要素看，高水平人才引育不足。智联招聘《2022 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数据显示，2017—2019 年上海人才净流入占比呈下降趋势，同期杭州、广州人口净流入占比却一直上升。此外，2018 年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显示，北京信息

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达 138.9 万人，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达 140.4 万人，远高于上海的 69.3 万人和 56.8 万人。

三是从技术要素看，科学技术创新活力不强。2006 年上海专利审计受理数为 3.6 万件，比北京多 1/3，而 2021 年北京专利审计受理数为 25 万件，反超上海 20%。北京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和优势领域数量也超过上海。截至 2022 年 3 月底，北京拥有高新技术企业 26796 家，上海只有 19965 家，北京比上海多 34.2%。

三、 促进上海经济稳增长的动力机制和重点领域

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上海应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在“城市新投资、社会新消费”上实现增长，激发城市新需求；在“经济新开放、区域新协同”上实现突破，形成城市新势能；在“产业新赛道、企业新生态”上实现培育，引爆产业新热点；在“要素新配置、功能新辐射”上实现创新，发挥市场新效应，促进上海成为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交汇地。上海经济发展应围绕五大动力驱动机制、聚焦十三大重点领域，促进形成稳增长的发展路径。

（一）以投资消费“新型化”升级为驱动

1. 以新基建投资打造未来优势

新基建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数字底座”，远程办公、在线课堂等新模式新业态发展都离不开新型基础设施的支撑。中国信通院测算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新基建投资规模将达到 10.6 万亿元，仅 5G 网络建设就将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以及各行业应用投资超过 3.5 万亿元。上海应扩大有效投资，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新兴产业赋能。

2. 以城市更新活化城市发展新空间

根据国际经验，城市更新是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重塑城市风貌、提升城市功能的重要途径。上海应抓住城市更新机遇，借鉴国际经验，打造复合多元的空间载体，提高城市空间品质、完善公共配套设施，实现上海“城市空间倍增”“生态空间倍增”“产业税收倍增”等综合效应，缓解上海土地要素约束。

3. 以培育新消费触发排浪式消费浪潮

在传统消费无法激发消费热情的背景下，应通过新消费培育激发居民消费需求。在机械化、电气化、现代化 3 轮消费浪潮^①的基础上，积极培育以智能家居和智能穿戴为核心的“家庭智能化”消费浪潮。行业统计数据显示，在“十四五”时期中国智能硬件设备市场规模将保持两位数增速。上海应积极为新消费浪潮宣传造势，推动消费扩容提质，增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力。

（二）以生产服务“数字化”转型为驱动

1. 以加强产业新赛道投资培育引爆点

新兴产业发展潜力巨大，未来 10 年元宇宙、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市场规模将超过 20 万亿美元。从国际经验看，投资结构转型对经济发展转型至关重要，欧美国家推动新兴产业发展往往先从投资发力。上海应聚焦元宇宙、智能终端等新兴产业领域，加快项目投资建设，促进形成产业新供给，引爆产业发展新引擎。

2. 以工业互联网建设抢占互联网下半场

工业互联网是互联网下半场的“主角”，是加快传统工业向智能制造转变的关键。一些研究机构预测，2025 年全球工业互联网硬件和网络产品市场规模将达到 6000 亿美元，但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四个不会”^②难题。上海应培育一批数字化改造平台、独角兽工业互联网企业，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推动生产提质增效。

3. 以培育跨境电商发展增强外贸新动力

跨境电商将成为外贸发展新亮点。上海与广州、郑州等相比，跨境电商发展相对滞后，制度创新不如部分兄弟省市(如近期“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融合模式给外贸发展带来强大动力，而上海尚未有相似探索)。上海应大力支持跨境电商发展，优化货物进出口以及退货退税等制度程序，增强外贸发展新动力。

(三) 以资产配置“国际化”整合为驱动

1. 以吸引国际资本推动科技创新

与全球顶尖城市相比，上海资本力量不足。截至 2022 年 6 月底，纽约纳斯达克市场总市值超过 23 万亿美元，为 4250 余家企业提供融资服务，而同期上海科创板总市值为 5.4 万亿元，上市企业仅 431 家。上海应探索发展离岸资本市场，吸引全球资本为创新企业融资，助力技术创新突破。

2. 以吸引世界人才吸纳全球智慧

与全球顶尖城市相比，上海全球科技创新人才相对不足。截至 2021 年 2 月底，上海共核发《外国人工作许可证》27 万余份，其中外国高端人才(A 类)近 5 万份，而硅谷外籍科技人才超过 40 万人。上海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应探索人才快速流通的通道，加快集聚全球科技创新人才，吸引全球智慧为我所用。

3. 以“兼并购”整合中外市场资源

加快推动一批优质企业“走出去”，尤其是推动新能源、生物医药、互联网服务等优质企业“走出去”，是促进上海企业提级扩增、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重要途径。“兼并购”方式包括：收购、控股、合资。例如，创新型药企百利佳生与澳洲最大的 CRO 企业 Novotech 合并，成为亚洲最大的生物技术专业 CRO 平台，在共享整合团队和客户资源后，业务规模扩大 1 倍。

(四) 以产业发展“区域化”辐射为驱动

1. 以促进企业国内布局扩大经济辐射

重点推动新经济、大型商业、专业服务等生活性服务和生产性服务企业加大内地投资布局，促进产业协同融合，与内地打造“总部+支点”的产业链协同格局，增强上海服务全国的能力和水平。例如，医疗 SPD[®]供应链管理业务在全国医院迅速普及，上药器械 SPD 创新业务近 5 年复合增速超过 44%，并积极拓展二、三线城市医院渠道，上海可借助行业协会助力企业开拓市场。

2. 以长三角产业链重塑完善产业生态

长三角区域是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高地，各城市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如特斯拉 21 个核心供应商中 13 个位于长三角区域，占比超过 61%，若产业链供应链不稳定，将严重冲击生产生活秩序。上海应围绕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要求，瞄准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和节点，统筹“五个新城”及周边城市产业布局，提高产业发展协同能力和保障能力，以更高水平的世界级产

业集群参与国际竞争。

(五) 以企业群落“生态化”裂变为驱动

1. 以企业生态圈打造壮大市场主体群落

企业生态圈的打造主要有以下 5 种模式：一是龙头企业主导模式，如阿里巴巴、腾讯等龙头企业构筑起以企业自身为核心的 10 万亿元市值生态圈；二是产业园区主导模式，如苏州工业园区创新探索“园区+孵化器+基金+联盟”产服理念，把 BioBAY 生物湾打造成生物医药发展高地；三是投资基金主导模式；四是行业协会主导模式；五是第三方招商平台主导模式。上海应通过这 5 种模式，培育打造企业生态圈，形成巨大的市场主体群落。

2. 以优化营商环境激发企业活力

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够让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和个人无障碍地进入市场、获得资源，充分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上海应围绕疫情后企业生产经营和居民生活消费特点，聚焦重点产业，做好企业服务和公共服务工作，提升生产生活的便利性、快捷性，在市场准入、发展运营、市场监管等环节为企业解决发展的痛点、难点、堵点，疏通产业发展脉络，为市场主体创造快速成长的发展环境。

四、 推动上海经济稳增长的举措建议

(一) 实施“新基建超前建设计划”

一是推进“数字楼宇、街区”示范工程。围绕“五个新城”建设和城市更新，选取重点商业楼宇、商贸街区、创意园区等区域，加快基础设施信息化建设，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促进设施智能物联、数据相接，以数字化技术实现城市空间拓展，打造典型、示范型数字城市新空间。

二是打造一批“智慧城市功能性数字治理平台”。利用政务、民生、公共服务等领域海量数据资源，建设城市全要素数据资源体系，重点围绕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和社会治理“一网统管”平台，建设数字孪生城市。聚焦临港新片区、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等重点区域，推动社会治理互联设施体系和智慧大脑工程建设，促进形成社会数字治理示范效应。

三是积极开展“数字小区”试点。围绕培育新经济、壮大新消费等需求，支持大数据、虚拟现实、元宇宙等新技术加快在社区深化应用，聚焦家政、养老、健身、物业等领域，加快推动交通、物流、医疗等终端数字软硬件设施建设，开发数字产品和服务。

四是打造一批智慧交通新设施。完善新能源汽车充换电公用、专用设施建设。深入开展智慧道路建设，实施新一代全息感知与智能管控的智慧道路研究及建设试点，建设国内领先的车路协同车联网和智慧道路。打造智能化“海空”枢纽设施，积极推动港口基础设施和航空设施的 5G 和物联网技术应用，增强非接触式物流保障能力。

(二) 实施“新城市空间活化计划”

一是打造“枢纽型多功能综合体”。重点围绕商圈楼宇、地铁换乘站等，探索高密度混合用地，推进建设 3~5 座枢纽型多功能综合体(如日本新宿地铁站交通枢纽综合体)、垂直社区(如新加坡启汇城垂直研发综合体)，打造功能复合多元的空间载体，提升土地利用效率。

二是推进“多功能低碳地下城”建设。加强重点商务楼宇、交通连接点、文化场所等区域 15~40 米的中层地下空间开发，建设一批地下商业城、地下科技城。探索建设与地铁站点相连的地下步行系统，连接地下商场，形成地下街道，提升地下空间通达性和经济性。

三是打造“世界级都市文化休闲示范空间”。利用上海“一江一河”水岸资源，丰富海派文化资源，抓住黄浦江、苏州河两岸贯通和环境改善契机，注入时尚、科技、文化等功能，活化运用海派历史建筑空间，打造弘扬海派文化的具象空间和演艺场所，打造世界级都市核心滨水活力带。

(三)实施“新时代刚需点燃计划”

一是引爆“家庭智慧化”消费热潮。利用虹桥火车站、南京东路商业街、人民广场等高水平展示平台或空间，为智能家电、智能汽车、智能穿戴产品提供集中竞技的展示空间、媒体推介、组织策划等支持，并通过发放消费券、放松消费信贷等方式，推动新一轮智能消费热潮在上海率先形成。

二是推动进博会“买全球、卖全国”升级。推动更多中小企业依托进博会开拓进口业务，扩大人工智能产品、农副产品、家居用品和母婴儿童用品进口，优化消费供给。推动更多产品入驻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东方国际进口商品国别(地区)展销中心等“6 天+365 天”常年展示交易平台，促进市民消费。

三是开展“品牌高地建设行动”。结合拼多多“新品牌计划”、盒马鲜生“盒马 X 加速器”、小红书“未来品牌”等孵化计划，帮助培育内地优质工农业产品品牌，打造品牌培育室。依托上海旅游节、上海电影电视节等，帮助内地企业做好农业和文旅产品宣传，打造品牌展示间。鼓励南京路、淮海路、新天地、环球港等商圈引入国内品牌首店、旗舰店、体验店，打造品牌新发地。

四是开展“免税百店”活动。在南京路步行街、虹桥商务区、北外滩等中心城区和有条件的新城选址建设 100 家市内免税店，争取放开市内免税店国内居民出境购买限制，并增加免税购物额度。提升离境退税便利度，实现退税标识全覆盖。

(四)实施“新赛道产业引爆计划”

一是推动开展“元宇宙创新创业大赛”。与元宇宙头部机构合作主办“元宇宙创新创业大赛”，聚焦线下购物、家庭服务、展示展览等场景，通过大赛“揭榜挂帅”发掘元宇宙优质设计方案、创新项目和优秀应用成果，为获奖团队提供人才落户、科研创新、基金投资等支持。

二是开展“碳普惠”平台建设试点。围绕“双碳”战略，建立覆盖交通、公共服务、健康服务等领域的碳积分体系，积极培育碳交易市场，大力推动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等绿色金融产品，推动重点行业、企业、区域扩大碳交易试点。

三是开展沙盒监管“百企新进”行动。围绕新兴产业发展新品推广应用、质量监管等问题，选取 100 家新业态企业，实施“沙盒监管”模式，在一定规则范围内允许企业开发新业态、测试新产品，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在更加开放宽松的环境下开展创新业务试点，促进创新企业发展。

(五)实施“工业互联网建设计划”

一是实施“数字化转型伙伴行动”。竞争性筛选平台企业数字化转型优惠产品，建立上海数字化转型伙伴服务商和解决方案清单，搭建平台企业(转型服务供给方)与中小微企业(转型服务需求方)的对接机制，鼓励平台企业开发更适合中小微企业需

求的数字化转型工具包、服务包。

二是开展“合同能源管理”模式试点。选择集成电路、汽车、化工、能源等重点领域，推动行业龙头企业、平台企业与上下游供应链企业加强对接，借鉴上汽人工智能实验室“合同能源管理”模式经验，建立成本共担、收益共享的数字化赋能机制。

三是开展“工业大脑”数字化试点。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高端装备等重点产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共性技术需求，积极培育一批工业互联网平台，以“工业互联网平台+工业App服务”模式为突破口，帮助企业构建智慧化生产系统及模式，不断提升产业发展数字化水平。

(六)实施“新贸易方式培育计划”

一是建设“跨境电商功能平台”。加快国家级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和市级跨境电商示范园区建设，加快建设跨境电商运营中心、物流中心和结算中心，进一步提升其能级。支持物流企业、电商平台、贸易企业在海外建设“海外仓”，并实现共建共享。

二是搭建跨境电商绿色通道。加快推进上海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药品试点、跨境电商B2B出口试点等工作，完善跨境电商零售出口退货机制，优化退货流程，对符合条件的跨境电商零售出口商品准予不征税复运进境，提高通关效率，为跨境电商发展营造良好的进出口环境。

(七)实施“全球要素离岸引聚计划”

一是探索适时建立“国际科创板”。适时建立“国际科创板”，按照国际规则管理，由境外国际资金和离岸资金进行申购、投资交易，发行上海离岸型创新企业的股票，将纳斯达克“搬到”家门口，为上海的离岸创新创业企业上市提供融资服务。

二是建立国际科学技术人才“落户基地”。在临港新片区等区域建设世界顶尖科学家社区、国际学校、合作园区等，配套便利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和国际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加强人才免签制度、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创新，吸引世界顶尖科学家集聚上海。

三是探索建设“离岸研发中心”。争取海关支持，探索建立离岸研究院、离岸实验室、离岸工作站等基础科学研究和合作平台，创新相关器材、原材料等跨境许可、运输管理政策，提供接轨国际的网络通信管理服务。

(八)实施“企业加速国际融合计划”

一是设立“一带一路”走出去“前哨站”。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鼓励国内外贸行业商协会、贸易促进机构以及相关驻外办事处，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建立企业综合服务站，为“走出去”企业提供贸易投资和商事信息、法律、金融等的精准化服务，为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保驾护航。

二是设立“招商服务”外企母国“前哨站”。加强与国外政府部门、行业协会、投资促进机构等的联系，推动在欧美设立外企服务站，为外企投资上海提供企业注册受理、法律、税务、市场、政策咨询、展销展会等服务，积极吸引外企来上海投资。

(九)实施“企业全国战略投射计划”

一是开展“数字服务+内地生活”助力行动。完善在线新经济企业“走向内地”政策设计，通过采取奖励、资助、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一批拥有核心技术、用户流量、商业模式的远程办公、在线文娱、在线展览展示、在线医疗等领域的在线新经济

创新头部企业和领军企业走向全国。

二是开展“专业服务+内地运营”牵线行动。发挥上海金融、会计、法律、设计、咨询、物流专业服务优势，与内地特别是长三角区域加强协同，通过购买服务、奖励等方式，通过行业协会、投资促进机构及大型商会组织等积极牵线搭桥，帮助上海金融、会计、法律、咨询等专业服务企业拓展业务范围，促进专业服务与内地产业优势互补。

(十)实施“长三角产业链重塑计划”

一是实施“双向飞地”建设行动。通过委托管理、品牌输出、委托招商、股权合作、战略合作等方式，推动上海园区开发企业深度参与内地园区发展，对于内地企业需要利用上海专业服务、信息资源建立总部的，引导其在上海建立总部基地；对于需要在内地建设生产基地的上海企业，优先推荐其落地到内地协议园区。例如，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与慈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约定，上海企业要建立生产基地，优先推荐到慈溪；慈溪产业园区企业如需成立的总部性机构，则优先推荐到上海。

二是开展“科技孕养”行动。推动若干科技型园区与长三角园区建立一对一结对关系，建立“研发在沪+制造在外+总部留沪”的利益共享机制。前期研发阶段，上海孵化项目由内地给予资金资助；成果转化阶段，推动制造环节落地外地园区、研发总部留在上海。例如，浙江安吉与上海紫竹高新技术产业园合作成立“两山”双创园，将科技孵化项目引入园中培育，并给予资金支持，项目建设落地浙江安吉。

三是开展“供应链链条”强化行动。以汽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领域供应链配套建设为重点，支持龙头企业、总装企业加强供应商延伸管理，将三、四、五级供应商等纳入供应商库进行常态化管理。例如，上汽集团在上海疫情防控期间，率先排摸近400家供应商，协助支持其防疫及复产。同时，加强供应链监测和帮扶，建立长三角产业链供应链互保机制。

(十一)实施“企业生态圈构筑计划”

一是探索开展“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培育行动。选取重点商务楼宇或产业园区，为科技创新企业提供制造工厂、研发设计、展示销售、总部管理等一揽子载体空间、支持政策、资本渠道等资源，为企业打造完善便利的“功能生态圈”，助力企业落地发展。

二是探索开展“创新企业群落打造”行动。鼓励行业龙头企业、产业基金、行业协会、第三方招商机构等，聚焦市级特色产业园区发展导向，加快集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导入一批高能级的企业总部、研发中心等重点项目，打造垂直行业领域的企业生态圈，建立产业发展创新集群。

(十二)实施“企业发展环境提升计划”

一是探索开展“政策找企”行动。为中小企业提供免房租、减税费、给补贴等政策，尽快实现“大数据自动判别、免申请自动享受”，扩大政策受益面。减少线下审核，实现更多事项全程网办。

二是打造企业和市民“无接触办事环境”。拓展推广“电子亮证”应用场景，推动实现营业执照、身份证、居住证、驾驶证等通过“随申办”App及小程序“亮证”办理事项，并积极探索远程“亮证”“调证”手段。针对部分高频事项，实行“无人干预自动审批”。

三是开展产业“无障碍绿色通道”行动。聚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围绕新兴产业发展制度瓶颈、政策障碍等，在市场准入、进出口、市场监管等方面为企业发展破除痛点、难点、堵点，如为创新型药企原材料、生物制剂进

出口提供快速通道,建立集成电路产业电子化学品进出口免检绿色通道等,为新产业、新业务、新模式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注释

①三轮消费浪潮包括:1980年代以缝纫机、自行车为典型的“家庭机械化”消费浪潮;1990年代以彩电、冰箱为代表的“家庭电气化”消费浪潮;2000年代以轿车、住房为核心的“家庭现代化”消费浪潮。

②“不会转”:中小企业数字技术人才不足,数据采集率低,不会转型;“不能转”:制造业中小企业税后利润率仅为3%~5%,转型资金不足;“不想转”:数字化转型成本高,企业有心无力,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比例为25%,远低于美国(54%)和欧洲(46%);“不敢转”:麦肯锡报告显示,数字化转型失败的企业占比达70%。

③SPD (Supply、Processing、Distribution)医用耗材管理模式是在供应链一体化思想指导下产生的一种典型的精益化管理模式。它是以保证院内医用耗材质量安全、满足临床需求为宗旨,以物流信息技术为支撑,以环节专业化管理为手段,强化医院医用耗材管理部门的全程监管,协调外部与内部需求为主导,对全院医用耗材的供应、加工、配送等物流的集中管理模式。

参考文献

- [1] 陈宏民.新环境下上海推动平台经济发展的思路和举措[J].科学发展,2022(6):47-56.
- [2] 周安.发展数字经济为稳增长提供有力支撑[J].中国银行业,2022(6):38-40.
- [3] 邓丽姝,方方,陈楠.北京经济稳增长的对策建议[J].环渤海经济瞭望,2022(4):77-81.
- [4] 谭代兵.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研究[J].商场现代化,2022(11):105-107.
- [5] 余博,潘爱民.数字经济、人才流动与长三角地区高质量发展[J].自然资源学报,2022,37(6):1481-1493.
- [6] 李海刚.数字新基建、空间溢出与经济高质量发展[J].经济问题探索,2022(6):28-39.
- [7] 张智杰,郝园.“新基建”背景下数字经济发展对策研究[J].网络安全和信息化,2022(5):25-26.
- [8] 成祖松.高技术产业“双循环”的背景、战略与对策[J].科技中国,2022(4):65-68.
- [9] 路红艳,林梦,李睿哲.“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我国利用外资的新方向及政策建议[J].国际贸易,2022(4):46-54,81.
- [10] 罗小龙,朱胜秋,唐蜜,刘晓曼.“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J].中国名城,2022,36(4):31-36.